

抑郁专题

【编者按】 抑郁症是一种发病率较高的精神障碍,以显著而持久的心境低落为主要特征,抑郁发作时表现为情绪低落、兴趣缺乏等,部分患者存在自伤、自杀行为,对社会造成极大危害。给予及时、有效的治疗是改善抑郁症患者预后的重要因素。因此,本专题特纳入抑郁相关文献对此进行探讨,包括论著:《大学生网络受欺负对抑郁的影响:一个多重中介模型》、《童年创伤和家庭功能对青少年心境障碍患者自伤行为的影响》、《父母温暖和拒绝读高中生非自杀行自伤行为的影响》;综述:《抑郁症残留症状的临床现状及运动疗法的应用》。

大学生网络受欺负对抑郁的影响:一个多重中介模型

谢如月¹,刘连忠^{1,2,3},黄海¹,谈笑¹

摘要 **目的:**探讨大学生的抑郁症状与网络受欺负、个体的应对自我效能感、认知重评的关系。**方法:**采用网络受欺负量表、中国大学生心理健康筛查量表、应对自我效能感量表、情绪调节问卷对武汉某两所高校1 454例在校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大学生的抑郁症状检出率为4.76%,不存在性别差异。大学生的网络受欺负得分与抑郁总分呈显著正相关($r=0.16, P<0.01$),应对自我效能感与抑郁呈显著负相关($r=-0.37, P<0.01$),认知重评与抑郁呈显著负相关($r=-0.23, P<0.01$)。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应对自我效能感在网络受欺负与抑郁之间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25.68%,认知重评在网络受欺负与抑郁之间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5.71%,应对自我效能感与认知重评在网络受欺负与抑郁之间的多重中介效应占总效应3.07%。**结论:**应对自我效能感和认知重评在网络受欺负与大学生的抑郁关系中起多重中介作用。

关键词 网络受欺负;应对自我效能感;认知重评;抑郁

中图分类号 R741;R749.4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6780/j.cnki.sjssgncj.20211161

本文引用格式:谢如月,刘连忠,黄海,谈笑.大学生网络受欺负对抑郁的影响:一个多重中介模型[J].神经损伤与功能重建,2023,18(3):131-135,144.

Impact of Cyber-Victimization on Depression in College Students: A Multiple Mediating Model XIE Ru-yue¹, LIU Lian-zhong^{1,2,3}, HUANG Hai¹, TAN Xiao¹. 1.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Wuhan), Wuhan 430074, China; 2. Wuhan Mental Health Center, Wuhan 430022, China; 3. Wuhan Wudong Hospital, Wuhan 430084,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pressive symptoms in college students and internet bullying, individual coping self-efficacy, and cognitive reappraisal. **Methods:** A total of 1 454 college students from two universities in Wuhan were investigated by the Revised Cyber Bullying Inventory, College Students Mental Health Screening Scale, Coping Self-efficacy Scale, and Emotion Regulation Questionnaire. **Results:** The detection rate of depressive symptoms in college students was 4.76%, and there was no gender difference.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score of cyberbullying and the total score of depression ($r=0.16, P<0.01$), a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coping self-efficacy and depression ($r=-0.37, P<0.01$), and a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cognitive reappraisal and depression ($r=-0.23, P<0.01$). SPSS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coping self-efficacy between cyberbullying and depression accounted for 25.68% of the total effect,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cognitive reappraisal between cyberbullying and depression accounted for 5.71%, and the multiple mediating effect of coping self-efficacy and cognitive reappraisal between cyberbullying and depression accounted for 3.07%. **Conclusion:** Coping self-efficacy and cognitive reappraisal play multiple mediating roles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yber-victimization and depression in college students.

Keywords cyber-victimization; coping self-efficacy; cognitive reappraisal; depression

作者单位

1.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心理科学与健康研究中心
武汉 430074
2. 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
武汉 430074
3. 武汉武东医院
武汉 430084

基金项目

湖北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大学生发展与
创新教育研究中心
科研开放基金(No. DXS2022009)

收稿日期

2021-12-20

通讯作者

黄海
huanghai76@163.com

抑郁是影响大学生健康成长的严重心理问题,以往研究表明,超过20%的中国大学生患有抑郁症,而且这一比例在过去十年中一直在增长^[1-3],因抑郁、焦虑和压力导致的自杀行为在大学生群体中也不断增多^[4,5]。负

性生活事件是抑郁产生的主要原因,随着互联网迅速发展普及,网络受欺负的经历逐步成为个体抑郁的重要风险因素。网络受欺负是指个体在电子信息交流过程中反复受到其他个体欺负的现象^[6]。一些研究表

明,网络受欺负对个体的抑郁症状有重要的预测作用,暴露于网络欺负行为会增加遭受网络欺负大学生抑郁甚至自杀的风险^[7-9]。Maria等^[7]对1 282例大学生进行调查后发现,遭受了网络受欺负的大学生会表现出高度的抑郁、焦虑,甚至产生自杀意念;另外一项为期12月的纵向研究也发现,网络受欺负经历能显著地预测个体抑郁症状的发生^[10]。

网络受欺负影响抑郁的形成可能是一个复杂的机制,会受到个体信念与认知方式的影响,如应对自我效能感和认知重评。应对自我效能感是指一个人在面对压力的情况下运用有效的应对策略的能力的信念^[11],它被认为是个人在遭遇网络欺负后能否主动采取行动保护自己的关键因素^[12]。Trompeter等^[13]研究发现,应对自我效能感与网络受欺负之间呈显著负相关,并在网络受欺负和抑郁之间起着部分中间作用。除应对自我效能感外,认知重评也会影响网络受欺负的应对过程。认知重评是指个体有意对事件的意义进行有选择性的解释,是自我调节的一个重要方式^[14]。研究表明,相比于实施网络攻击行为的个体,网络受欺负者会表现出更大的情绪失调^[15]和认知重评能力下降,而低认知重评水平的个体更有可能发展出抑郁症状^[16,17]。

综上所述,网络受欺负经历是影响大学生抑郁的又一重要因素,然而目前二者关系的研究较少,尤其缺乏对其内在影响机制的探讨,因此,本研究拟以武汉市大学生为被试,探究网络受欺负影响个体抑郁的内在机制,以及分析应对自我效能和认知重评在网络受欺负经历与抑郁症状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为日后预防与干预措施的有效制定提供理论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采用整群方便抽样法,选取武汉市某两所综合类高校共1 454例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删除不认真作答和不完整问卷25份,最终得到有效问卷1 429份。其中,男生650例(45.5%),女生779例(54.5%)。本次调查共包括三个年级,分别为大一556例(38.9%,男生254例,女生302例),大二457例(32%,男生209例,女生248例),大三416例(29.1%,男生187例,女生229例),年龄17~22岁。

1.2 研究工具

1.2.1 网络受欺负量表修订版(Revised Cyber Bullying Inventory, RCBI) 国内修订的中文版RCBI包含网络欺负和网络受欺负两个分量表^[18],本研究采用网络受

害者分量表测量被试在最近6个月内遭受网络欺负的频率。网络受欺负分量表共有14个项目,采用“1=从未遇到”至“4=3次以上”4点计分,得分越高表明网络欺负卷入程度越深。在本研究中该问卷的Cronbach's α 系数是0.72。

1.2.2 中国大学生心理健康筛查量表(College Students Mental Health Screening Scale, CSMHS) CSMHS由方晓义等^[19]编制,该量表包括96个题目,三个筛查级别,22个维度指标。本研究采用二级筛查中的内化心理问题部分测量抑郁症状。该量表是描述过去一个月内是否符合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做出判断,采用“1=一点也不像我”至“4=非常像我”4点计分,量表得分越高,表明抑郁症状或困扰的程度越严重,在抑郁维度上得分标准分 >2 分,可认定该个体有较高抑郁风险,需要尽快进行面对面访谈且重点关注,以便于及时进行干预^[20]。本研究中该问卷的Cronbach's α 系数是0.83。

1.2.3 应对自我效能感量表(Coping Self-Efficacy Scale, CSES) CSES由Singh等^[21]在2011年编制,本研究中经由两名心理学专业研究生翻译成中文,并由两名英语专业研究生修正语言形成中文量表。该量表包含16个条目,用于评定青少年应对同辈欺负的应对自我效能感。例如,“和别人谈谈你的感受”。使用“1=从不,5=总是”5点评分,得分越高表明个体的应对自我效能感越强。在本研究中该问卷的Cronbach's α 系数是0.89。

1.2.4 情绪调节问卷(Emotion Regulation Questionnaire, ERQ) ERQ共10个条目,分为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2个分问卷^[22]。本研究选取其中的认知重评分问卷,共6个条目,采用“1=从未如此”至“5=总是如此”5点计分,得分越高,表示认知重评水平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问卷的Cronbach's α 系数是0.82。

1.3 统计学处理

使用SPSS 26.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描述性统计、皮尔逊相关分析,通过独立样本 t 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不同组别大学生抑郁症风险检出率;使用统计软件SPSS 26.0的插件process检验网络受欺负、应对自我效能感、认知重评和抑郁症状之间的中介关系,通过Bootstrap程序检验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为排除因问卷法而导致的共同方法偏差,采用

Harman单因素方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结果发现有10个因子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数,且第一个公共因子能解释的变异量为19.86%,小于Podsakoff等提出的40%的判断标准^[23],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

2.2 描述性统计及差异分析

在网络受欺负方面,48.2%的大学生在过去6月中至少有过一次被欺负的经历,就性别而言,男性检出率为56.77%,女性检出率为47.63%,男性显著高于女性($\chi^2=11.86, P<0.01$)。抑郁症状方面,参照方晓义等的标准,有4.76%的大学生存在极高的抑郁症风险,就性别而言,女性检出率为4.75%,男性检出率为4.77%,性别差异无统计学意义($\chi^2=0.05, P>0.05$)。

2.3 大学生抑郁风险在不同变量间的分布情况比较

不同性别、年级的大学生在抑郁症风险发生率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网络受欺负、应对自我效能感与认知重评得分在有无高抑郁症风险之间有统计学意义($P<0.01$),见表1。

2.4 网络受欺负、应对自我效能感、认知重评及抑郁的均值、标准差及相关关系

对各变量进行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后,得到各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和相关系数,网络受欺负与抑郁呈显著正相关($r=0.16, P<0.01$),与应对自我效能感呈显

著负相关($r=-0.14, P<0.01$),与认知重评呈显著负相关($r=-0.14, P<0.01$),应对自我效能感与抑郁呈显著负相关($r=-0.37, P<0.01$),认知重评与抑郁呈显著负相关($r=-0.23, P<0.01$),见表2。

2.5 变量间的中介模型分析

采用SPSS 26.0中的插件process将性别和年级作为控制变量,对全部变量进行中介模型分析。各变量间关系的回归分析表明网络受欺负能显著负向预测被试的应对自我效能感($\beta=-0.59, P<0.01$);网络受欺负显著负向预测认知重评($\beta=-0.17, P<0.01$),应对自我效能感能显著正向预测认知重评($\beta=0.16, P<0.01$)。当网络受欺负、应对自我效能感和认知重评同时预测抑郁时,网络受欺负显著正向预测抑郁($\beta=0.11, P<0.01$),而应对自我效能感和认知重评显著负向预测抑郁($\beta=-0.07, P<0.01; \beta=-0.05, P<0.01$),见表3。考虑到网络受欺负对抑郁的直接影响仍显著,应对自我效能感和认知重评在网络受欺负和抑郁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网络受欺负影响抑郁的三条间接途径对应的间接效应及其差异的显著性检验结果见表3。应对自我效能感和认知重评的总间接效应(0.057, 占总效应的34.46%)的bootstrap 95%置信区间不含0值,表明两个

表1 不同组别大学生抑郁风险检出率比较

变量	组别	人数	抑郁症状			
			低风险/%	高风险/%	χ^2/t 值	P值
性别	男	650	495(76.15)	31(4.77)	0.05	>0.05
	女	779	559(71.76)	37(4.75)		
年级	大一	556	403(72.48)	24(3.08)	0.237	>0.05
	大二	457	328(71.77)	22(4.81)		
	大三	416	323(77.64)	22(5.29)		
网络受欺负 M/(SD)			1.10(0.17)	1.21(0.32)	-2.99	<0.01
应对自我效能感 M/(SD)			3.75(0.68)	3.03(0.67)	8.50	<0.01
认知重评 M/(SD)			5.37(0.85)	4.76(0.90)	5.95	<0.01

表2 描述性统计结果和变量间的相关性(N=1 429)

变量	M	SD	网络受欺负	应对自我效能感	受害者角色分离	避免攻击性行为	主动行为	避免自责	认知重评	抑郁
网络受欺负	1.10	0.15	1							
应对自我效能感	3.63	0.69	-0.14 ^②	1						
受害者角色分离	0.89	0.32	-0.11 ^②	0.76 ^②	1					
避免攻击性行为	0.90	0.21	-0.07 ^①	0.73 ^②	0.32 ^②	1				
主动行为	0.95	0.21	-0.13 ^②	0.65 ^②	0.30 ^②	0.35 ^②	1			
避免自责	0.88	0.23	-0.09 ^②	0.78 ^②	0.40 ^②	0.54 ^②	0.35 ^②	1		
认知重评	5.29	0.84	-0.14 ^②	0.36 ^②	0.19 ^②	0.31 ^②	0.29 ^②	0.30 ^②	1	
抑郁	1.54	0.43	0.16 ^②	-0.37 ^②	-0.24 ^②	-0.28 ^②	-0.30 ^②	-0.28 ^②	-0.23 ^②	1

注: ①P<0.05, ②P<0.01, ③P<0.001

中介变量在网络受欺负和抑郁之间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该中介效应包含三条途径产生的间接效应:第一条途径为网络受欺负→应对自我效能感→抑郁,其间接效应值为0.045,置信区间不包含0值,表明中介作用显著;第二条途径为网络受欺负→认知重评→抑郁,其间接效应值为0.01,置信区间不包含0值,表明该途径产生的间接效应显著;第三条途径为网络受欺负→应对自我效能感→认知重评→抑郁,其效应值为0.005,置信区间不包含0值,表明该途径产生的间接效应显著,见表4。

对不同途径产生的间接效应进行两两比较的差异显著性检验,结果发现比较1(途径1和途径2间接效应之间的差值)和比较2(途径1和途径3间接效应之间的差值)的bootstrap 95%置信区间不含0值,这表明途径1的间接效应显著高于途径2和途径3。比较3(途径2和途径3间接效应之间的差值)的bootstrap 95%置信区间含0值,表明途径2和途径3的间接效应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见图1。

3 讨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48.2%的大学生在过去6月中至少有过一次网络受欺负经历,与Kowalski等研究结果相似^[24],说明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大学生手机、电脑等电子设备的使用频率与时长不断增加,这可能会加大其网络受欺负的风险。与以往的研究结果^[25]相似,在

性别方面,男生网络受欺负得分显著高于女生,即男生遭受网络欺负的频率和程度高于女生,可能是相对于男性而言,女性具有高度的同理心和道德脱离,更有可能采取自我保护措施并感知周围环境系统的支持^[26],能减少其网络受欺负的经历。本研究结果还显示,4.76%的大学生存在高抑郁症风险,与2021年常模中的检出率4.78%相似^[20],大学生处于从家庭走向社会的重要过渡期,面临的挑战由单一的学业压力转变为适应、实践、表达、社交等多方面能力要求,加之离开家庭所产生的孤独感,都是容易引发大学生抑郁的重要因素。因此,网络受欺负以及抑郁的大学生应引起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的重点关注。

本研究探讨了网络受欺负和抑郁症状之间的直接效应,结果与先前的研究一致^[27,28],即大学生的网络受欺负经历能直接正向显著预测抑郁,网络受欺负可能是大学生抑郁症发生的一个显著风险因素。根据网络受欺负的一般攻击理论,网络受欺负经历首先会引发受欺负者的负面情绪,如抑郁、焦虑,并提高其负面情绪唤醒水平,加之在网络上遭受欺负的大学生通常容易保持沉默,较少向老师和家长求助,其感知到的社会支持水平更低^[29],因而容易引发长期的抑郁状态。

本研究发现,在控制性别和年级后,应对自我效能感和认知重评在网络受欺负和抑郁的关系中起到多重中介作用,丰富了大学生网络受欺负对抑郁症状影响的内在机制的相关研究,并为后续对大学生心理健康

表3 各变量间关系的回归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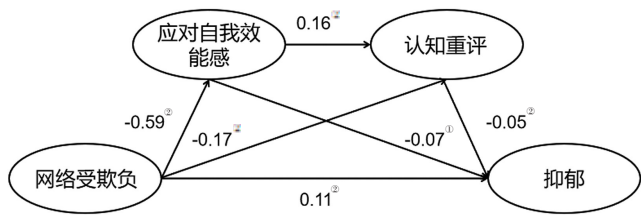
回归方程		整体拟合指标				回归系数显著性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R	R2	F	P	β	t	P
应对自我效能感	网络受欺负	0.14	0.02	9.28	<0.001	-0.59	-5.13	<0.001
	认知重评	0.38	0.15	61.15	<0.001	-0.17	-3.50	<0.001
抑郁	应对自我效能感	0.41	0.17	56.60	<0.001	0.16	14.09	<0.001
	网络受欺负					0.11	4.43	<0.001
	应对自我效能感					-0.07	-12.13	<0.001
	认知重评					-0.05	-4.16	<0.001

注:模型中各变量均经过标准化处理后带入回归方程

表4 应对自我效能感和认知重评的中介效应分析

	间接效应值	Boot标准误	BootCI下限	BootCI上限	相对中介效应
总间接效应	0.057	0.010	0.038	0.079	34.46%
Ind1 网络受欺负->应对自我效能感->抑郁	0.043	0.009	0.027	0.062	25.68%
Ind2 网络受欺负->认知重评->抑郁	0.010	0.004	0.003	0.018	5.71%
Ind3 网络受欺负->应对自我效能感->认知重评->抑郁	0.005	0.002	0.002	0.009	3.07%
比较1(Ind1-Ind2)	0.033	0.010	0.014	0.054	
比较2(Ind1-Ind3)	0.038	0.008	0.023	0.055	
比较3(Ind2-Ind3)	0.004	0.004	-0.002	0.012	

注:Boot标准误、Boot CI下限和Boot CI上限分别指Bootstrap方法计算的间接效应的标准误、95%置信区间的下限和上限



注:①P<0.01, ②P<0.001

图1 应对自我效能感和认知重评中介作用示意图

的引导和干预提供了方向。首先,与以往研究结果相似,网络受欺负会通过应对自我效能感对抑郁产生间接影响,表明网络受欺负经历会降低个人的应对自我效能感,导致其体验到更多的抑郁情绪。这可能与应对自我效能感的特点有关,班杜拉的自我效能感理论认为,个体的成败经验是影响自我效能感的主要因素之一^[32],网络受欺负作为一种失败的网络人际交往体验,也会导致个体的应对自我效能感降低。同时,依据网络保护动机理论,自我效能感是个人采取自我保护行为的重要前置条件^[29],因此,在网上遭受欺负后,大学生应对自我效能感会降低,自我保护行为也会减少,从而减弱了对自己的情绪管控,导致其会体验到更多的抑郁情绪。

其次,本研究还发现了认知重评在网络受欺负与抑郁症状的关系中起着部分中介作用,即当大学生经历网络受欺负后,积极的认知重评能降低其抑郁程度。认知重评是个体自我调节的重要方式,它能指导个体重新解释由负性事件唤起的主观意义,从而改变由事件引起的负性情绪。因此,当大学生遭受网络受欺负等消极的生活事件时,积极的认知重评可以帮助他们从这些负性的事件找出新的积极角度,赋予其积极的理解,从而减少抑郁情绪的产生。同时,fMRI的研究证据也表明,积极的认知重评可通过杏仁核显著唤起以海马区为基础的新联想形成和以纹状体为基础的精神奖励来调节情绪,从而产生一种新颖和积极的情绪体验,而且可以形成长期记忆,在减少抑郁等负面情绪中具有长期效果^[33]。这提示未来可以通过指导大学生建立积极的认知重评策略来降低网络受欺负所产生的抑郁情绪,维护其身心健康。

最后,本研究还发现了应对自我效能感可以通过认知重评影响大学生的抑郁症状,这一链式中介作用表明应对自我效能感和认知重评可以共同缓解负性生活事件给个体带来的负面身心影响。自我效能感是压力情景下个体进行认知评估的重要资源^[34],在经历网络欺负行为后,应对自我效能感水平高的大学生更容易将此事看做是挑战而非威胁^[35],从而更倾向于使用

积极的认知重评策略,更多关注压力性事件中的积极因素,提高心理弹性,降低抑郁症状发生的可能性。在高校的心理健康教育实践中,教育者应该既教授大学生掌握处理负性情绪的调节方式,又要培养大学生应对负性生活事件的自我效能信念。强而稳定的应对自我效能信念与积极的认知重评方式相结合,有助于个体合理管理情绪,促进身心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 Liu X, Gao X, Ping S. Post-1990s college students academic sustainability: The role of negative emotions, achievement goals, and self-efficacy on academic performance[J]. Sustainability, 2019, 11: 775.

[2] Liu Y, Zhang N, Bao G, et al. Predictors of depressive symptoms in college students: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cohort studies [J]. J Affect Disord, 2018, 244: 196-208.

[3] 罗晓路.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现状与对策[J]. 教育研究, 2018, 39: 112-118.

[4] Hirsch JK, Rabon JK, Reynolds EE, et al. Perceived stress and suicidal behaviors in college students: Conditional indirect effects of depressive symptoms and mental health stigma[J]. Stigma Health, 2019, 4: 98.

[5] 孙思琦, 王薇, 康丽君, 等. 探究与大学生抑郁症自杀未遂行为相关的社会心理因素[J]. 神经损伤与功能重建, 2021, 16: 506-509.

[6] Kowalski RM, Giumetti GW, Schroeder AN, et al. Bullying in the digital age: A critical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cyberbullying research among youth[J]. Psychol Bull, 2012, 140: 1073.

[7] Martínez-Monteagudo MC, Delgado B, Díaz-Herrero N, et al. Relationship between suicidal thinking, anxiety, depression and stress in university students who are victims of cyberbullying[J]. Psychiatry Res, 2020, 286: 112856.

[8] Marco JH, Pilar Tormo-Irun M, Galan-Escalante A, et al. Is cybervictimization associated with Body dissatisfaction, Depression, and Eating Disorder Psychopathology?[J]. Cyberpsychol Behav Soc Netw, 2018, 21: 611-617.

[9] Stevens F, Nurse J, Arief B. Cyber stalking, cyber harassment and adult mental health: A systematic review[J]. Cyberpsychol Behav Soc Netw, 2020, 24: 367-376.

[10] Cole DA, Zelkowitz RL, Nick E, et al. Longitudinal and incremental relation of cybervictimization to negative self-cognitions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in young adolescents[J]. J Abnorm Child Psychol, 2016, 44: 1321-1332.

[11] Benight CC, Bandura A.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of posttraumatic recovery: The role of perceived self-efficacy[J]. Behav Res Ther, 2004, 42: 1129-1148.

[12] Doane AN, Boothe LG, Pearson MR, et al. Risky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 behaviors and cyberbullying victimization: An application of Protection Motivation Theory[J].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016, 60: 508-513.

[13] Trompeter N, Bussey K, Fitzpatrick S. Cyber victimization and internalizing difficulties: The mediating roles of coping self-efficacy and emotion dysregulation[J]. J Abnorm Child Psychol, 2018, 46: 1129-1139.

[14] Buhle JT, Silvers JA, Wager TD, et al. Cognitive reappraisal of emotion: A meta-Analysis of human neuroimaging studies[J]. Cereb Cortex, 2014, 24: 2981-2990.

[15] Estévez E, Estévez JF, Segura L, et al. The influence of bullying and cyberbullying in the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of victims and aggressors in adolescence[J]. Int J Environ Res Public Health, 2019, 16: 2080.

[16] Dryman MT, Heimberg RG. Emotion regulation in social anxiety and depression: A systematic review of expressive suppression and cognitive reappraisal[J]. Clin Psychol Rev, 2018, 65: 17-42.

[17] Chirico A, Lucidi F, Merluzzi T, et al. A meta-analytic review of the relationship of cancer coping self-efficacy with distress and quality of life [J]. Oncotarget, 2017, 8: 36800.

参考文献

[1] Nock MK. Self-Injury[J]. Annu Revi Clin Psychol, 2010, 6: 339-363.
[2] 苏金花,何珊珊,张甲. 青少年期间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心理问题探究[J]. 心理月刊, 2022, 17: 182-184.
[3] 苟双玉,杜美杰,刘晓容,等. 中国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检出率的Meta分析[J]. 现代预防医学, 2023, 50: 263-271.
[4] 魏亚美,孙伟铭,董香丽,等. 非自杀性自伤行为青少年的家庭教养方式[J].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2021, 48: 793-794.
[5] 马云青,乔晓光,邢晓沛. 父母温暖和拒绝与学龄儿童违纪行为的关系:冷漠无情特质的调节作用[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22, 30: 139-143.
[6] Marion D, Laursen B, Zettergren P. Predicting Life Satisfaction During Middle Adulthood from Peer Relationships During Mid-Adolescence[J]. J Youth Adolesc, 2013, 42: 1299-1307.
[7] 蒋奖,鲁峥嵘,蒋蕊菁,等. 简式父母教养方式问卷中文版的初步修订[J]. 心理发展与教育, 2010, 26: 94-99.
[8] 万宇辉,刘婉,郝加虎,等. 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行为评定问卷的编制及其信效度评价[J]. 中国学校卫生, 2018, 39: 170-173.
[9] 张迎黎,张亚林,张迎新,等. 修订版青少年依恋问卷中文版在初中生中应用的信效度[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11, 25: 66-70.
[10] Kaufman EA, Cundiff JM, Crowell SE. The Development, Factor Structure, and Validation of the Self-concept and Identity Measure (SCIM): A Self-Report Assessment of Clinical Identity Disturbance[J]. J Psychopathol Behav Assess, 2014, 37: 122-133.
[11] Yin W, Brooke L, Ying S, et al. Accuracy of the Hospital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cale Depression subscale (HADS-D) to screen for major depression: systematic review and individual participant data meta-analysis[J]. BMJ, 2021, 373: n972.
[12] Gnanavel S, Robert RS.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Fifth Edition, and the Impact of Events Scale-Revised[J]. Chest, 2013, 144: 1974.
[13] 徐子尧,黄亚玲,朱光强,等. 中国青少年抑郁症患者非自杀性自伤行为发生率的Meta分析[J]. 四川精神卫生, 2022, 35: 331-336.
[14] 向均怡,金柳荫,钱红,等. 人际关系对青少年抑郁症患者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影响[J]. 神经损伤与功能重建, 2022, 17: 444-448.
[15] 冯玉. 国外有关自我伤害功能模型的研究述评[J]. 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 2007, 28: 60-61.
[16] Lang J, Yao Y. Prevalence of nonsuicidal self-injury in chinese middle school and high school students A meta-analysis[J]. Medicine, 2018, 97: e12916
[17] 陈芸莉,严万森. 高中生非自杀性自伤行为与家庭和校园氛围及自我控制系统的关系[J].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022, 30: 950-955.
[18] 郭霜霜,焦婷,马颖,等. 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家庭影响因素分析[J]. 中国学校卫生, 2022, 43: 768-771.
[19] Liu C, Munakata T, Fujiyama H, et al. Mental health and psychosocial factors with single-child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an urban city of China[J]. Nihon Koshu Eisei Zasshi, 2003, 50: 15-26.
[20] 石云鹏,刘伟方. 父母教养方式与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关系:心理病理症状的中介作用[J]. 心理月刊, 2020, 15: 16-18.
[21] 李佳依,丁菀,孙赵星,等. 父母教养投入与儿童孤独感:自尊与同伴依恋的中介作用[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21, 29: 842-845.
[22] Gandhi A, Luyckx K, Molenberghs G, et al. Maternal and peer attachment, identity formation, and non-suicidal self-injury: a longitudinal mediation study[J]. Child Adolesc Psychiatry Ment Health, 2019, 13: 1-11.
[23] Gandhi A, Claes L, Bosmans G, et al. Non-Suicidal Self-Injury and Adolescents Attachment with Peers and Mother: The Mediating Role of Identity Synthesis and Confusion[J]. J Child Fam Stud, 2016, 25: 1735-1745.

(本文编辑:王晶)

(上接第135页)

[18] 褚晓伟,范翠英. 网络欺负量表修订版在中国初中生群体中的修订及信效度检验[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7, 25: 1031-1034.
[19] 方晓义,袁晓娇,胡伟,等. 中国大学生心理健康筛查量表的编制[J]. 心理与行为研究, 2018, 16: 111-118.
[20] 易晓明,定险峰,薛璟,等. 《中国大学生心理健康筛查量表》测量结果解释的优化[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21, 29: 962-966.
[21] Singh P, Bussey K. The development of a Peer Aggression Coping Self - Efficacy Scale for Adolescents[J]. British Journal of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011, 27: 971-992.
[22] 王力,陆一萍,李中权. 情绪调节量表在青少年人群中的试用[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07, 15: 236-238.
[23] 周浩,龙立荣. 共同方法偏差的统计检验与控制方法[J]. 心理科学进展, 2004, 12: 942-950.
[24] Zhou Z, Tang H, Tian Y, et al. Cyberbullying and its risk factors among Chinese high school students[J]. School Psychol Int, 2013, 34: 630-647.
[25] 石绪亮,朱亚,张耀倩,等. 大学生网络受欺凌经历与自杀行为的关系:睡眠障碍与抑郁症状的链式中介作用[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20, 28: 1125-1129.
[26] Lambe LJ, Della CV, Hong IK, et al. Standing up to bullying: A social ecological review of peer defending in offline and online contexts[J]. Aggression and violent behavior, 2019, 45: 51-74.
[27] Jenaro C, Flores N, Frias CP. Anxiety and depression in cyberbullied college students: A retrospective study[J]. J Interpers

Violence, 2021, 36: 579-602.
[28] Wang W, Xie X, Wang X, et al. Cyberbullying and depression among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A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of social anxiety and neuroticism[J]. J Affect Disord, 2019, 256: 54-61.
[29] Doane AN, Boothe LG, Pearson MR, et al. Risky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 behaviors and cyberbullying victimization: An application of Protection Motivation Theory[J].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016, 60: 508-513.
[30] Sheanoda V, Bussey K. Victims of cyberbullying: An examination of social cognitive processes associated with cyberbullying victimization[J]. J School Violence, 2021: 1-14.
[31] Özdemir EZ, Bektaş M. The effects of self-efficacy and locus of control on cyberbully/victim status in adolescents[J]. J Pediatr Nursing, 2021, 61: e15-e21.
[32] 高申春. 自我效能理论评述[J]. 心理发展与教育, 2000, 16: 60-63.
[33] 姚海娟,王琦,李兆卿. 情绪调节中的认知重评创造力[J]. 心理科学进展, 2022, 30: 601-612.
[34] Zhou Z, Tang H, Tian Y, et al. Cyberbullying and its risk factors among Chinese high school students[J]. School Psychol Int, 2013, 34: 630-647.
[35] Mikolajczak M, Luminet O. Trait emotional intelligence and the cognitive appraisal of stressful events: An exploratory study[J]. Personal Individ Differ, 2008, 44: 445-453.

(本文编辑:王晶)